

# 在中国发现史学

## ——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合理进路

□王振红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调适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始终是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时刻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在列强入侵、西学东渐的特殊情势下,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曾陷入全面拥抱西方与简单排斥西方的窘境;而今在“全球化”视野下立足自我历史文化传统,对中国史学进行“在地化”的研究,将开放的心胸与自觉的文化意识结合起来,当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合理进路。

**关键词:**中国史学;西方史学;在中国发现史学;在地化;全球化

自从梁启超 1902 年揭橥“新史学”的大旗以来,近代中国史学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此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追寻西方与立足自我始终是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面,而此两者在此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却始终处于排斥、纠缠以及融合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形,在梁启超本人的史学研究中就有着明确的体现:梁氏倡导“新史学”之初,激烈地批判传统史学,主张以科学的精神、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学术与思想,其热切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自不待言;然而,梁氏晚年的《春秋载记》等著作却不再“沿用早期进化史观与涵盖律式因果法则的历史解释,而主张从中国自身历史脉络之发展,与民族文化之特殊性来进行理解”<sup>[1]</sup>,显然,梁氏晚年又回归了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

### 一、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窘境

在近代列强入侵、国事维艰、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情势下,梁启超提倡的科学方法、进化史观成为学习、拥抱西方学术思想文化的风向标,而其回归自我历史文化传统的做法却被认为是改变了态度、换了方向<sup>[2]55</sup>,乃至成了退步落后的表现。在此期间,冷静思考、平心而论中西史学的学者虽然存在,但只是很少的少数了,主流则是试图以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重新建构中国的史学研究。然而,中国史学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

传统,其悠久历史与发达程度远超西方。所以,与科学乃至哲学不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史学的时候“不可能脑子里纯净得像白板一样去信奉它”<sup>[3]39</sup>。但遗憾的是,悠久发达的史学文化并没有促成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自主,与中国的科学、哲学等学科一样,近现代的中国史学研究一直处于追随乃至全面拥抱西方的状态中。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种饰以“科学”面目的西方史学的陌生概念在 20 世纪迷惑了中国人的历史想象,于是将西方经验下独有的史学术语、范畴和理论在所谓科学方法的名义下不加甄别地输送给中国史学<sup>[3]38-40</sup>。

其实,以今天的眼光反观西方的近现代史学,可以说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西方史学那样尴尬,它步履蹒跚地刚刚从中世纪神学的笼罩下解脱出来,便很快沦为科学和哲学的附庸,而当科学的神话和哲学的迷思尚未被人们完全打破与洞悉的时候,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又开始在史学的领地里恣意横行,而今,后现代主义又从根本上将其消解得七零八落。所以,相对于西方史学,近现代的中国史学研究的窘境似乎又多了一重,那就是不断地追随西方的史学潮流,从历史分期、历史观念、理论体系到体裁体例、结构布局乃至话语系统,无不深受西方史学的左右;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史学固有的历史观念、历史思维、认识模式、话语体系等不是被动地

收稿日期:2013-06-12

作者简介:王振红(1980-),男,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被忘记了,就是被主动地扭曲了、消解了。西方史学的潮流不断翻新,是西方社会的外在环境与西方学术的内在理路交互演变的产物,与西方人崇尚差异、拒绝相同的个性一脉相承;而近代以来中国史学不断追随西方史学思潮的做法直接导致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时常陷入跟不上西方、找不着自我的窘境。

## 二、它山之“石”只可为“错”

《诗经·小雅·鹤鸣》有言曰:“它山之石,可以攻错。”又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古人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它山之“石”只是磨刀的工具,其功能来琢“玉”,而绝非“玉”本身。然而,当光怪陆离的西方史学思潮涌入到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时,中国史学家往往将自家的优良传统置之脑后,纷纷奉西方思潮为宗主,真可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史学与其说是它山之“石”,毋宁说是入室正室之“玉”,大有入室操戈、取而代之之势。对此,张光直先生感叹道:“中国的历史也同西方一样惊心动魄,一样的宏伟壮观。但人们还没有把它作为总结普遍规律的研究对象,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中国和西方相撞时,社会思想的传输是单向的:从西方流往中国。……近年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范式、模式、理论、架构,被运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上,但直接依靠中国原始材料的基础研究却难得一见。”<sup>[4]24</sup>就连西方学者芮沃寿(Arthur F. Wright)都指出:“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从西方借取了方法,然后是概念,最后是理论体系。”<sup>[3]40</sup>对于具有三千多年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而言,如此全方位地拥抱西方史学,若非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自觉意识,那便是震惧于西方的强大而乱了自家的阵脚,丧失了起码的判断力与批判精神。

例如,仅就“方法”而言,西方近代史学确实形成了系统而缜密的科学方法,重要的是,这些方法诸如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分析法、综合法等无不经过了科学的、逻辑学的乃至语义学的洗炼。以归纳法为例,它最初只是培根在科学实验中得出的方法,其意图在于通过观察、归纳具体事实进而寻求一般结论;关键是,西方人不仅运用逻辑推演的方式将归纳法抽象出普遍的形式( $S_1$ 是P, $S_2$ 是P,……, $S_n$ 是P,因此,所有S都是P),而且还辨明了它的功能与局限(任何一种归纳都无法穷尽过去与现在的全部事例,也很难保证没遗漏任何一个反例,更难确定将来不发生

反例)<sup>[5]</sup>;不仅如此,西方人还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等其他方法相互为用,编织成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这些经过严格逻辑洗炼的方法,犹如淬炼之后的利器确实极大地推动了包括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学术的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者认识到西方史学方法的巨大效用,纷纷将它们引入中国。毋庸讳言,这些方法确实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巨大发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史学方法及其个中蕴含着的科学分析的逻辑观念,毕竟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与西方社会、思想总是试图寻求某种“法则”、“秩序”、“普遍性”、“确定性”的思维模式相辅相成。而所有这些,皆与中国史学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多有扞格不通之处。而与此宗旨相应,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史学方法,诸如“阙疑之法”<sup>[6]</sup>、“好学深思,心知其意”<sup>[7]</sup>、“知人论世”<sup>[8]</sup>、“核其本末”与“旁参互证”<sup>[9]</sup>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方法确实存在着内涵界定不明确、逻辑论证不周延、语义表达不清晰等这样那样的不足,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方法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立足中国人自己的眼光体察中国历史的结晶,它们应是理解中国史学最恰当的方法。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庄子的寓言来比喻,中国史学作为一个整体犹如浑沌,虽然七窍不通,但它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中国古代史学方法恰与此浑沌体息息相通、相辅相成。然而,利用西方史学方法认识中国史学,其结果是浑沌的七窍被开通了,其内在的构造、机能或许被分析得清楚明白了,但这个鲜活的生命体及其蕴含着的内在精神却奄奄一息,乃至死掉了。

一般而言,在学术研究中作为工具的“方法”最具普适性。即便如此,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学依然很难圆融无碍,更遑论运用西方概念与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历史了。近代以来,由借用概念、理论而造成的历史扭曲、认识混乱俯拾即是。如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的“发展”或“进步”概念意味着人类历史是一个在某些超人力量(如上帝或自然法则)指导下的不可逆过程,这种历史目的论的观念与中国史学格格不入<sup>[3]38</sup>。又如,现代中国学者总是运用西方的历史认识论,从主体、客体及其关系出发去认识中国历史,但是,中国历史的许多观念却是主体、客体以及二者关系所无法全部囊括或融通的。如章学诚以“尽其天而不益以人”<sup>[10]</sup>界定其“史德”说,而接受了西方历

史认识论的胡适等人却将章氏之“天”视为客观，“人”视为主观<sup>[11]</sup>。其实，章学诚是从“气”、“情”、“理”、“性”等传统观念出发阐释“天”、“人”以及“史德”的内涵的，其“天”既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其“人”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史学家的主观意识。显然，这种以今释古、转化传统的做法表面看上去甚为得法，实质上脱离了清代的思想文化背景，是对章学诚的严重曲解。

要而言之，无论是方法，还是概念与理论体系，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特定文化传统的产物。在中西文化交流融会的过程中，脱离文化传统而“借用”异质文化，它们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副作用亦随之而生。所以，它山之“石”只能磨我琢“玉”之刀，最多直接用来琢我之“玉”；若将它山之“石”等同于“美玉”，必然会导致“桔生淮北则为枳”的苦果。所以，面对西方不断翻新的史学思潮，一方面要保持开放、会通的心胸，真正了解西方史学思潮，以发挥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的效用；另一方面则要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务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我与西方，在吸收西方史学思想的时候，不致使“母体文化的基本点受到扭曲和压抑”<sup>[12]152</sup>。

### 三、立足自我 在中国发现史学

实际上，当中国学者孜孜以求追寻西方的时候，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却提出了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他主张从中国人的眼光出发来研究历史<sup>[13]</sup>。当然，柯文所谓的中国眼光依然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企图，是他们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自我反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中国眼光依然是柯文这一代学者的西方眼光，因其问题意识与精神旨趣依然来自西方自身<sup>[14]</sup>。即便如此，柯文研究历史的视角与方法依然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的中国中心说，折射了以柯文为代表的一代学者的西方眼光；同样，我们探究西方史学的眼光与旨趣则应当立足中国，应该具有中国眼光与中国关怀，亦即，将中国史学研究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首先置于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

20世纪以来，经历了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所谓优势愈来愈遭到质疑，加之第三世界的蓬勃兴起，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此情形下，西方人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学术领域都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中心论业已成了明日黄花。就史学而言，西方学者纷纷

开始反思、突破那种建立在进步史观基础上的构建现代性、宣扬宏大叙事的民族国家史学。于是传统的历史叙事开始复兴，被忽略的“边缘”地带走向了研究的中心，“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方兴未艾……。西方史学的自我否定与急剧转向，对不停地追随西方的中国史学研究不啻当头一棒。以此为契机，而今的许多中国学者开始深入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境遇，进而自觉地立足中国的历史实际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研究中国史学，开启了“在中国发现史学”的新篇章。

中国史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所以，研究中国史学首先应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尊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在中国发现史学”，即由此特殊性出发进而揭示中国史学的本质特征。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这些寓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的特殊性已引起中西学者的深入关注。例如，刘家和先生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立足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的演变考察、界定古代中国的历史理性<sup>[15]</sup>。无独有偶，安乐哲等西方学者亦认为“中国式的‘理性’无法用那种超历史、超文化的人类本能语言，或者诸如此类的一套概念范畴来解释，它必须求诸于‘有关合理性的历史实例’”<sup>[16]15</sup>。又如，杜维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史学注重载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而希腊史学总量的4/5却在描述战争<sup>[17]</sup>。而王晴佳先生则针对当下西方新史学“自下而上”研究“边缘”的主张，指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向来与一些文化的精英有关，如果抹去孔子、老子、司马迁等名字，那么，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一定会变得很苍白<sup>[29]</sup>。上述诸例足以表明，研究中国史学只能立足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切不可盲目追随西方。

近代以来，强势的西方全面介入中国之后，学术研究中强人以就我，强我以就人的情况泛滥成灾，而今到了深入反思、对等比较的时候了<sup>[18]</sup>。这种立足自我、对等比较以阐发传统、沟通西方的理路，与我们所言之“在中国发现史学”庶几近之。

实际上，这种立足自我、对等比较以阐发传统、沟通西方的理路，正是安乐哲所主张的“差异比较与沟通理解”<sup>[16]11</sup>，更是对中国古人“和而不同”观念的现代诠释。不仅如此，彼此尊重对方的特殊性，进而寻求各方的沟通理解，也是对西方中心论以及普适性理论体系的拒斥。由此，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没有建立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sup>[19]</sup>的忧虑也许可以缓解：一则，中国古代史学似乎对于建立系统而宏大的理论体系向来没有



多少兴趣,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念念不忘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意欲抗衡西方,其骨子里仍是西方为标准,依然是中国史学不自主的表现;二则,西方已经为构建那种普遍有效性的宏大体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sup>[3]54</sup>,所以,建立普适性的理论体系是否为世界史学的正确方向尚难判定;三则,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套用西方史学的方法、概念乃至理论体系,已造成了无数的历史扭曲、传统误读。

所以,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还是重新审视传统,拨去由近代中西交流而带来的种种迷障,还中国史学的本来面目以揭示其特殊性,在此基础上进而寻求与他者的沟通与理解。黄进兴先生曾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素材,从中创发量材适身的研究途径,以求真正地提升中国历史的理解。”<sup>[20]</sup>西方学者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挪威学者约翰·伽尔唐(Johan Galtung)明确指出:“被西方训练的非西方史学家,在其著述中将会以西方人的眼光来反映非西方的历史,而他们若是作为自己文化的见证者,就不再是那么可信的了,因为他们那西方化的眼睛会对某些事物过分关注。他们被西方玷污了。”<sup>[12]144-145</sup>在此基础上,伽尔唐认为对于西方史学研究,能够为其提供的真正反例,“应该更多地来自‘真正’的非西方,而不是被西方训练过的非西方”<sup>[12]152</sup>。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发现史学”就显得越发重要了,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中国史学的独立自主,而且也对方史学具有正面的借鉴价值。对此,张光直先生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无论如何,中国的材料都将对史学理论做出重大的贡献:或以扎实的新资料证实这种理论,或对它作某种程度的修改,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概括将会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准确性。”<sup>[4]125</sup>

总之,“在中国发现史学”,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乃至全球化的视野下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立足中国自身的历史实际自主地研究中国史学,通过挖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特殊性,进而与其他类型史学的特殊性加以比较,最终寻求相互沟通、理解

的新途径。如果不立足自我的特殊性、做到真正的“在地化”,不仅对于“他者”没有真正的借鉴价值,而且也没有真正参与到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来,也就没有对文化“全球化”发挥自己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 潘彦竹:钱穆对梁启超民族史学与文化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兼论钱穆对梁启超学术进化史观的批评[J].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009(5).
- [2] 胡适.四十自述[M].台北: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
- [3] 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C]//.历史与当下·第二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4]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M].北京:三联书店,2013.
- [5] 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33-237.
- [6] 张京华.日知录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2011:141.
-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46.
- [8]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51.
- [9] 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404.
- [10]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320.
- [11] 何炳松.章实斋先生年谱·何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13.
- [12] 约翰·伽尔唐.西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史学思想[A].新史学·第七辑[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 [13]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2002:170.
- [14] 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8-49.
- [15] 刘家 and.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9-69.
- [16] 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7] 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50-153.
- [18] 章益国.章学诚“史德”说新解[J].学术月刊.2007(12).
- [19] 易宁.马克垌先生访谈录[J].史学史研究.2000(2).
- [20]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8:247.

(责任编辑 张耀南)

**Abstract** Adjusting for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has been an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roblem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With the invasion by Western powers and Western learning's progressively extending to the Eas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was thrown into a dilemma: fully westernized or totally repudiate it. It is a reasonable approach of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to be based o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o adapt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to localization and to combine open-mind with self-conscious cultural awarenes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Western history science; to find history science in China; localization; globalization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